

从石库门到南湖畔：1921年的那场会

“你们是C.P.还是S.Y.?”

“我们是S.Y.”

“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

这段对话，问的人是李达，答的人是毛泽东。C.P.是指共产党，S.Y.是指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既然来了就参加”的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毕竟，“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是回望历史时才一目了然的。当时出于保密，多数接到开会通知的代表连来开什么会都不清楚。那时候，中国社会有200多个政治党派，每天成立的组织和解散的组织一样多。

1945年举行的中共七大前夕，毛泽东在预备会上作报告，动情地回忆起一大时的情形。他说，中国《庄子》里有句话叫“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组织。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再次引用了这句“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他说：“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不忘初心，无疑需要回到其作始之时：1921年7月23日，风穿行于上海的里弄之间，起于南湖之上。

上海“二李”

北李南陈，

两大星辰，

漫漫长夜，

吾辈仰承。

要开会了，但是一开始就遇到难题：“北李南陈”一个都不能来。

第一个到的，是24岁的北大学生张国焘，约在6月下旬就到了。他一到上海就展开了“穿梭外交”，首先去老渔阳里2号拜访了李达，又去望志路106号拜访了李汉俊。

“二李”与陈独秀一道，都是上海党组织的发起成员。与人们的印象不同，它的名称从来不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从1920年8月成立起就叫“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南下广州，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把书记职务交给了李汉俊代理。

但不久，李汉俊即与陈独秀发生冲突。李达回忆，冲突的起因是，当时党的工作每月需要经费约200元，但党员大多没有职业，无力负担。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李汉俊希望由书社每月划拨200元，陈独秀不同意，且在《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费方面也起了一些争端。此外，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李汉俊也提出了一个自己的草案，陈独秀认为李汉俊等反对他，双方裂痕越来越深。李汉俊坚决辞职，于1921年2月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交给了李达，书记也由李达代理了。

因此，一大的会务主要是李达承担的。他给每个地方组织写信，通知派两人来开会，信是由他以个人名义发出。每位代表发给路费100元，回去再给50元。经费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供的。马林1921年6月3日到达上海，此行的任务就是帮助筹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老渔阳里2号是《新青年》编辑部，李达住在楼上的亭子间。他秉性直率，学者气很重，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一言不合就瞪大双眼瞪视对方。他很看重跟共产国际的关系，但觉得马林太骄傲，很难沟通，双方谈得不大投机。

李汉俊通晓四国语言，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不轻易附和别人的意见，总是坦率地表明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

李汉俊说，开代表大会其他都好办，目前最重要的是厘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马林曾“毫不客气”地要他报告工作，他拒绝了，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期，没什么好报告的；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他说中国共产党还没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决定，现在根本谈不上。在他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不应该自居领导地位。

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马林是荷

兰人，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就是多少有一点“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总是以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自居，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不过，他在碰了“二李”的钉子后急于打破僵局，也调整了自己的态度。

张国焘一向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充当联络人，如今又周旋于二李和马林之间，开支经费等都由他一力协调。如此一来，他反客为主，很快成了会议的主导者。

另一位来自北京的代表刘仁静也到得比较早。他先去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7月6日左右到达上海。

张国焘和刘仁静都属于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这是李大钊呼应陈独秀的建党活动在北大沙滩红楼建立的，当时已有16名党员，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

为什么李大钊没来出席大会呢？

刘仁静回忆，接到李达通知开会的信后，张国焘、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和他自己在西城区一所补习学校开会讨论，罗章龙和邓中夏都说自己有事，就决定张国焘和刘仁静去。刘仁静说，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自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估计一方面是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他们当时开会时也没有推选他。

罗章龙回忆的推选过程跟刘仁静相当一致，而且还具体说到李大钊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至于李大钊自己又是什么说法，令人遗憾地没有任何人提到过。

“北京D学暑期旅行团”

位于上海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私立博文女子学校是一栋两层楼石库门房子，外墙青红砖相间，典雅大方。时值暑假，学生都放假了，学校空着，只有厨役一人每天看门兼做饭，清静方便，又便于保密。

“二李”与这间学校的校长黄绍兰都颇有渊源。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还当过博文女校董事长、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于是由她出面，以“北京D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下了楼上几间房，付了两个月租金。房间里没有床，好在是夏天，王会悟买了些芦席，用于在红漆木地板上打地铺。

从日本回来的周佛海住当街靠东的一间。他在日本鹿儿岛留学，利用暑假回来参加，算是代表他和施存统两个旅日党员。留学日本几年，他谈起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来头头是道，对筹备工作也很积极。

当街靠西一间住着来自济南党小组的王尽美和邓恩铭。两人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话不多，总是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

再往西是湖南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的房间，这原是职工宿舍，屋里摆放着两张单人板床。毛泽东收到李达通知开会的信后，便约上何叔衡来到上海。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埃德加斯诺回忆了自己去出席一大的前后。他说，对这个会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个人都是中国知识界领导人。他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时，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第二次去上海时，曾与陈独秀讨论了自己所读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他一生很关键的这个时期，陈独秀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独秀也同样对毛泽东印象深刻，他在上海建党后，长沙也列入了他的建党计划，并明确“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1920年10月，毛泽东收到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即着手在湖南建团。

这也成为要确定一大时期党员名单的一大难点：当时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难以分清，特别是1920年底到1921年夏这半年，很多党员是以青年团面目出现的。

那时的毛泽东在同学间有个绰号叫“毛奇”。毛奇是与俾斯麦齐名的普鲁士帝国元帅，雄心勃勃，才智过人，性格沉默寡言。毛泽东的密友、新民学会会员萧瑜说，自己一个格子能写两个字，而毛泽东写两个字起码占三个格子。

毛泽东经常在自己住的房间里走走想想，有时其他人经过窗前跟他打招呼，他却浑然不觉，被一些人说成“书呆子”。李达认为，毛泽东后来做全党领袖，这时已露了端倪。

武汉支部的董必武和陈潭秋在结束了教学工作之后，于七月初一起乘坐客轮顺长

江而下。到上海后，他们先住在湖北善后公会内，会议开幕前夕才住进博文女校。

董必武是在五四运动时结识比自己小10岁的陈潭秋，觉得陈充满朝气而又朴实无华，两人一见如故。1920年1月，董必武和张国恩等共同筹办了私立武汉中学，陈潭秋成了学校的英语老师，学校很快成为了传播新思想的红色据点。

1920年8月，董必武收到湖北老乡、好友李汉俊从上海寄来的信。李汉俊在信中写道：“我们现在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他告诉董必武，上海已成立了党组织，希望他和张国恩在武汉也组织起来。董必武想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陈潭秋。

武汉是除上海之外中国大工业相对集中的城市，有工人近30万。成立党组织的各方面条件已比较成熟，1920年10月，陈独秀派刘伯垂回武汉组建了武汉支部。成立会是在董必武寓所内召开的，参加的人有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和郑凯卿。经刘伯垂提议，包惠僧被推举为书记。不久后，又组建起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

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在武汉中学举行了青年团第一次会议，董必武发表了热情讲话。他说：新思想正向我们扑面而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我们自然要投身到正酝酿之中的新的运动中去。参加这场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他以五四运动为例告诉同学们，不要说我们人少，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以着手改造社会。他还引用《国际歌》的歌词说，“不要把我们看得分文不值”。

1921年7月20日，包惠僧也从广州坐海船到了。他是武汉支部的书记，却从广东来，这为一段百年公案埋下了伏笔。

包惠僧回忆，武汉支部成立时刘伯垂带了两三百元经费，此后上海每月寄来200元作为活动经费，寄了两三个月。经费是由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派遣来华的维金斯基提供的，不久维金斯基回国，经费就断绝了。其他人都回家过年去了，包惠僧一人在武汉几乎“无钱举火”，遂去上海找党。

李汉俊告诉他：“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包惠僧以前是新闻记者，李汉俊知道他跟陈独秀比较熟，要他去广州找陈独秀谈一谈，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或者把党的机构搬到广州去。1921年5月，包惠僧好不容易筹措到15元路费，到广州去见陈独秀。陈独秀对这两种意见都不同意，因正在用人之际，就留包惠僧暂时在广州工作。

陈独秀到广东后，于1921年春建立了共产党广东支部，最初的成员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都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大毕业生。包惠僧来后，每天没事就到陈独秀的“看云楼”住处聊天，有时也参加广东支部的活动。

包惠僧回忆，一天陈独秀召集他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李汉俊的来信，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他回上海，要广州支部派两个代表出席，还寄来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陈公博是办报的，了解的情况多；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就可以回去工作。

所以包惠僧就这样来了。但他的“代表资格”，从当时到现在都众说纷纭。

张国焘和周佛海等认为他是湖北代表，湖北的董必武和陈潭秋认为他是广东代表，广东的陈公博说广东就他一个代表，刘仁静则觉得包惠僧属于“串门”的代表。

或许因为他究竟“代表”哪里这一点不好处理，会后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代表人数被写成12名。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曾向毛泽东请示，都说代表是13人，惟李达说是12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论不知孰是？毛泽东肯定地答复是12名。因此，他在13位一大参会者中成了独立的一支：“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

包惠僧1927年脱党，曾官至国民党内政部人口局局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前夕暂居澳门。看到开国大典的消息后，他一口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书信，给周恩来和董必武各打了一封电报，急切而又委婉地表达盼望回归之心。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他回来，但认

为他过去不是普通党员，要对党有一个交代。他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并写了一份长达3万言的《思想总结》，后被安排在国务院参事室，受到很好的待遇。

他在自传中说：“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从毛主席以下，多半是我少年时代的伙伴。他们从艰苦中创造了新时代，我很欣慰，也很惭愧。我回到了我的老家，我精神上很感觉温暖，仍然免不了惭愧。”

最后一个到的是陈公博。他顺道带着太太新婚旅行，从广州到香港登上邮轮，于7月21日才姗姗来迟，住进豪华的大东旅社，并不加入这个“北京D学暑期旅行团”。大家觉得，他就像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

7月22日，部分代表在博文女校开了一次碰头会，包惠僧说“像是预备会”，陈潭秋称之为“开幕式”。会上推选张国焘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和周佛海任记录。

7月23日是一个周六，这天晚上，代表们陆续从后门进入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家。

这是一座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砖间镶嵌白线，门上有大型雕花。黑漆大门上配有铜环，门框围以石条。屋子开间不大，一进后门就是厨房，通过一个倾斜度较大的楼梯上楼，从街上看不到楼上。

李汉俊与哥哥李书城同住，106号和108号内部打通，人称“李公馆”。李书城是同盟会元老，当时他和夫人都外出了，房子空着。公馆正门临街，有后门通向贝勒路德里，环境僻静，离博文女校不到一站地。这一切使得这里成为一个比较理想的秘密开会的地方。

晚8时左右，开会者全部到齐入座。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一共13人，代表着全国58名党员。此外，还有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可能出于保密考虑，楼下餐厅里的一张大餐桌被抬到了楼上书房里。每人座位前一只白瓷小茶碗，几份油印文件。开会者们随意围坐，先来先坐，不讲究座次。北大英语系的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给他当翻译，坐在另一侧的李汉俊有时也翻译几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这样开幕了。

会议首先通过了四项议程：一起草党纲，二起草党章，三决定中心工作和方针，四选举。

马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题为《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马林身材高大，一脸络腮胡子使得38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他用英语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声如洪钟，口若悬河，给毛泽东留下“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印象。包惠僧觉得大家都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

马林讲毕，尼克尔斯基致辞。他不懂英语，在座只有马林稍懂俄语，因此他的致辞很简单，主要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建议大会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进程。

两个外国人出入目标太大，因此从第二天起，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不再参加。第二天的大会，各地代表自由发言，报告各地情况，阐述对要起草的文件意见。

包惠僧回忆，董必武和陈潭秋推他代表武汉支部报告工作，但没有太多可以报告的，因为成立不久，做的事不多。毛泽东也作了一次发言，介绍长沙支部的情况。他话不多，总是留心听别人的发言，这是他在会上少有的一次发言。

这天的会上还推选出张国焘、李汉俊、刘仁静等共同起草党纲、党章。起草期间，其他人休会两天。

起草者们汇聚了大家的意见和陈独秀的来信。他们同意，党纲是必须有的，党章现阶段则可从略，有个简明的党章要点就够用了。

陈独秀来信是由陈公博带来的，主要谈了四点意见：(下转第37版)